

学林

◀ (上接3版)

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住,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



黑漆盒绘图仪器,康熙年间清官造办处制作。上下两层,内装绘图仪器30余件,及一存放墨水的蓝色水丞。现藏故宫博物院

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蹕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水陆交通要道如临清、扬州和南京等地,传教士都早就建有教堂。康熙专门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长子、大王爷胤禔)在这些地方就领票事召见传教士,详细询问他们有关礼仪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传教士按照遵守利玛窦规矩、领票,才能在中国永久居住,否则就要驱逐到澳门或回国。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他到镇江打听消息。4月1日,康熙到达扬州,巴多明介绍了五位在镇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即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和索玛诺,其中穆德我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4月2日,这五位传教士被介绍给直郡王,直郡王问他们是否愿意领票,是否遵循利玛窦的规矩。他们回答说,愿意领票,并遵守利玛窦规矩,但多罗让他们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询问,他们并没有改变主意,这让直郡王十分生气。于是康熙发布

谕旨,将他们遣送广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国人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此五人俱着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龙安国、博贤士来时,一并同来,给票不给票之处那时定夺,伊等的道不必传。

当时在南京集中了约二十名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以外,还有曾追随多罗的意大利教士施体仁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赫宣。传教士们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是否领票表态。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表示愿意遵守,并永不回西洋。而施体仁和赫宣则表示不愿遵守利玛窦规矩,不愿领票,于是遭到直郡王的训斥: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张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宁府西洋人施体仁,问得施体仁是同多乐到中国的也不久,中国的字还认不得,赫宣是同薄显世到中国的,中国的书略读过些。问:“你们的教同利玛窦合不合?”他两个说:“利玛窦只是敬天主,与我们相合,别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你们是这样的胡说,甚不合理。当初利玛窦未到中国之先几千年,我中国道理没有一些不好,尔等若不到中国更好。日本一个小国,尔等去一个、杀一个,尔西洋把他怎么样?若你们再说甚么胡话,我都拿杀了。倘我天朝大国要杀尔等,又怕甚么?”限尔等五日内速往广东赶上多乐说这个旨意。倘多乐又有别的胡说议论,连多乐都拿来杀了。若尔西洋为杀了多乐发兵来,我就与他打仗,尔九万里都能到中国来,难道我还不能与你们打仗么?有在中国的西洋人不传教,单自己修道也罢。尔等赶上多乐,一齐回去,若迟悞了,着尔等交与督抚拿锁锁了,解到广东澳门去。钦此。

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对传教士态度已十分严厉。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赫宣,依大里亚国人施体仁,交与江宁总督巡抚,五月内起程往澳门去,同多罗同回去。伊等若过限期,督抚即上锁送往广东澳门。”不仅如此,其他各地的传教士也同样受到朝廷的盘问,先后有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孟尼、董默觉,意思巴尼亚国人巴禄茂、万多默、方济国、赖鸣远、罗森铎、山若兰、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驱逐前往澳门去,意思巴尼亚国人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里亚国人劳弘纳(恩)五月内即驱逐往澳门去,以上

西洋人不曾给票。

而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则在不久领到了北京发给的票——这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继续居留传教的护身符。

在南京发生的拒绝领票事件之后,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扬州接见了那些愿意领票的传教士,直郡王为此发了敕文,《钦命传教约述》这样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钦颁敕文,各载履历,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珂、宁波郭中传、绍兴龚当信,四月初四日叩謁于杭州行宫。二十六日,各省传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扬州行宫陛见,俱蒙恩赐筵宴,并赐纱缎,钦颁敕文,永在中国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谕云:“领敕之后,尔等与人犹如一家人了。”其敕文俱命直郡王亲手授付。臣等伏聆圣谕,柔惠远人,尊崇天主,陶淑万民,至矣至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领到票的临清州的方济各会士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颁给的执照。

康熙南巡其实是观察当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绝佳契机。我们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驾的皇长子直郡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与传教士面对面地接触,颁票与否都由他定夺。当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严厉对待传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张,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有着康熙的幕后支持。有清一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继承最为惊心动魄,但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康熙的诸皇子都颇有才能,没有哪一位能占有绝对优势。康熙帝在培养教育皇子方面尽心尽力,幼年时对他们严格要求,成年后让他们各有所司,将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构成了皇家统治的重要一环。从南巡中放手让直郡王负责外交事

务即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看到一般只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瞩目,其官员负责皇帝与传教士的沟通,俨然成为当时的涉外机构。这些官员如赫世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们不仅询问不同的传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罗和传教士的一言一行,并随时上报皇帝,为康熙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依据。

南巡当中皇帝与传教士的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最后一次南巡,可说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直郡王或者说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约服从利玛窦规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则领有教皇严命,禁止礼仪,要求他们不得遵从“利玛窦规矩”。要么遵从中国礼仪,要么离开中国,去留都是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最后导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 熙南巡对于清代政治有着重大意义,在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然很少触及外交这一层面。随着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逐渐由怀柔远人、用其技艺的宽容,到了怀疑其学说并限制其传教的警惕,最终上升到了清廷与教廷的直接对立,其矛盾冲突在最后一次南巡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利用国内和欧洲所藏的中西档案和文献,揭示了一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层面,希冀还原康熙时代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日本海外考古的基础

邵学成

日本考古学的正式创立是1916年滨田耕作(1881—1938)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京都大学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26年,利用清政府给日本的庚子赔款,滨田耕作联合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东方考古学会”,这是一个中日两国考古学者共同研究交流的学会,定期派遣留学研究人员。派遣到中国的第一届留学生是驹井和爱、第二届是水野清一、第三届是江上波夫,之后陆续是田村实造、三上次男。中方因经费困难当时只在1928年派出庄尚严一人。

在田野考古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于中亚研究和人类起源问题正热情高涨,对欧亚地区的北方青铜文化高度关注。1930年4月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等人赴张家口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1930年8—9月,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区进行调查,对鄂尔多斯式样青铜器出土地和环境进行调查;11—12月对内蒙古新石器遗址进行调查;1935年水野清一和滨田耕作对赤峰红山进行发掘。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以中国东北为中心,辐射东北亚地区,截至二战后共出版《东方考古学丛刊》15册,奠定了日本海外考古的基础。

中方的庄尚严后来主要从事博物馆研究,1933年参与故宫文物南迁,1935年参与组织一批殷墟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和其他故宫文物赴伦敦中国艺术博览会展览,1940年挑选故宫文物赴苏联展览。